

賴澤涵來文： 讀吳俊瑩一文의 回應

賴澤涵^{*}

摘 要

吳俊瑩博士在《臺灣史研究》第 29 卷第 4 期發表〈「拂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一文，列舉了兩本專書及一本研究報告：《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吳君認為這三本著作雖在不同時間撰寫，觀點有所調整，但基本上有些論點均有延續性，在事件背景、鎮壓過程以及責任歸屬等方面均有為國民黨開脫殺害臺灣人之嫌。本人係為後二書之作者，乃秉持「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治史精神，且依據可取得之檔案資料，撰寫此文反駁吳君對後二書之相關論點，以期釐清事實。

關鍵詞：馬若孟、魏萼、國民黨、國家安全局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榮譽教授

來稿日期：2023 年 7 月 31 日；通過刊登：2023 年 11 月 4 日。

國史館協修吳俊瑩博士去年（2022）發表〈「拂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一文¹於《臺灣史研究》（以下簡稱「吳文」），該文應係於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年10月30-31日所舉辦「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製作「二二八」：拂塵專案研究〉一文的修正送審稿。論文討論了兩本研究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專書及一本研究報告。第一本是蘇僧、郭建成合著的《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以下簡稱《拂書》）；²第二本是Lai Tse-han（賴澤涵）、Ramon H. Myers（馬若孟）及Wei Wou（魏萼）合著的*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中文版為《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以下簡稱《悲書》）；³第三本是賴澤涵總主筆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⁴

1947年發生於臺灣的二二八事件，政府在事變後，禁止人民討論，但海外的二二八事件受難人、其家屬及同情因此事件被屠殺的人，每年在海外舉行各種紀念活動，而這些紀念活動的熱力也逐漸擴大。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尤其是國安局）深以為憂，乃想盡辦法對付。而對付這些被認為是臺獨分子或傾共人員的最好方法，是由情治單位提供史料，請學者撰寫二二事件的學術研究報告，搶解釋權以堵住種種不利國民黨的說法。

《拂書》於1986年出版，將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歸諸於各方野心家的煽動〔按：即指臺共、中共及皇民化派〕，結果是『臺胞』、『內地人』均受害，得利的是『共匪』」。⁵為此，該書「淡化事件發生時的政經背景」，並言「不存在廣大工人、農民群眾的民怨」，⁶同時也「揭示政府對事件處理採取寬大仁厚的政策」。⁷這本書雖然印了幾千本，但大部分都被「省訓團、軍訓處及軍中單位……作為教

¹ 吳俊瑩，〈「拂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臺灣史研究》（臺北）29：4（2022年12月），頁173-230。

² 蘇僧、郭建成，《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美國加州：南華文化事業公司，1986）。

³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文版由羅珞珈翻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⁴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⁵ 吳文，二、「拂塵專案」的規劃與執行，（四）《拂塵》的論述角度與重點，頁193。

⁶ 吳文，二、「拂塵專案」的規劃與執行，（四）《拂塵》的論述角度與重點，頁193。

⁷ 吳文，二、「拂塵專案」的規劃與執行，（四）《拂塵》的論述角度與重點，頁193。

育宣導使用」，此外，也提供給駐外單位或分送警、憲、黨政及大專院校圖書館。⁸但因「觀點過於鮮明，很難穿透臺灣民間或海外所主張的二二八論述」。⁹

《悲書》由魏萼引介馬若孟（Ramon H. Myers，時為 Hoover Institution 之 East Asian Collection 的資深研究員兼東亞圖書館的館長），自 1983 年 8 月開始研究工作。情治單位安全局認為研究二二八事件「如能由美國學術界的『友我人士』出版英文著作，對國安局而言，不啻是意外驚喜，更能貼近拂塵專案最初所設定的目標」。¹⁰

參與馬若孟研究團隊的有魏萼和本人兩人，而魏氏對馬若孟所提二二八事件研究計畫的審查意見，認為它「流露出馬若孟的研究計畫可與《拂塵》相互迴應」。¹¹

《悲書》「原預定 1986 年 6 月完稿，由胡佛研究所出版，同時出版中文本，出版前分章在美國雜誌發表。」¹²但該書「延遲了 7 年才正式出版」。¹³

《悲書》及後來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吳君認為「均揚棄官方事件對起因的陳說，不再以『奸黨煽惑說』來當作事件的主因，……不以共產黨主導來定位事件本質，……」。¹⁴但《悲書》把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的影響，以致於臺灣人的想法和世界觀與來臺的大陸人不同，這種文化衝突的觀點也被帶入了行政院研究報告對事件背景的分析中。¹⁵

至於二二八事件政府的鎮壓，吳君認為《拂書》、《悲書》和行政院的研究報告三書大抵均以陳儀從「妥協到用兵」的漸進演進論調，¹⁶只是行政院研究報告因利用蔣渭川的回憶錄及警總部分資料，把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製造紛亂及背後有陳儀、柯遠芬操控點出來。¹⁷所以政府派兵鎮壓，《悲書》「過於偏重官方善意，無視於最基本的時序問題。」¹⁸而行政院研究報告亦「解讀為陳儀希望原駐臺兵

⁸ 吳文，二、「拂塵專案」的規畫與執行，（四）《拂塵》論述角度與重點，頁 198-200。

⁹ 吳文，二、「拂塵專案」的規畫與執行，（四）《拂塵》論述角度與重點，頁 201。

¹⁰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二）馬若孟透過魏萼牽線搭上拂塵專案，頁 204。

¹¹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三）國安局對合作計畫的評估與看法，頁 207。

¹²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三）國安局對合作計畫的評估與看法，頁 208-209。

¹³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三）國安局對合作計畫的評估與看法，頁 209。

¹⁴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一）事件背景，頁 214-215。

¹⁵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一）事件背景，頁 215。

¹⁶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二）鎮壓過程，頁 217。

¹⁷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二）鎮壓過程，頁 217-218。

¹⁸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二）鎮壓過程，頁 218-219。

力『歸建』，認為『防範的作用大於鎮壓』。¹⁹ 可見三本著作在此觀點都有延續性，所以《悲書》及行政院研究報告才會「忽視統治者的權謀能力」。²⁰

至於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拂書》表明不可能探討，《悲書》則認為「事涉敏感不談」。²¹ 行政院研究報告雖檢討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張慕陶等人，但言「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²² 吳君認為不談責任問題是「除受限國民黨政府官員顧慮外，也是因為《悲劇性的開端》的觀點被帶入行政院報告中。」²³ 換言之，吳君在證明他所討論的三本書，其對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先歸之於共產黨，然後轉向共產黨並非事變主因，乃是一複雜因素所造成。

而三本書從最初不討論造成事變的陳儀，到後來的研究報告才檢討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彭孟緝等人在事件的角色，又說有顧慮不敢道出誰應負責任。其次，吳君認為從《拂書》以來有些觀點乃延續到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如報告過分強調文化因素，難免有為國民黨開脫責任之嫌。

上述乃吳君所討論的三本書，其中兩本與本人有關，而吳君似乎只在強調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研究觀點的轉向，與部分論點的延續性，且把所有執筆者都視為是替國民黨服務，似乎忘了史學研究的執筆者超然客觀的使命與立場。所以本人才撰寫此文，意圖澄清，使讀者不致混淆。

本人於 2022 年讀了吳文初稿後，曾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主辦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週年之回顧論壇」（2022 年 2 月 25 日），表示本人是首次聽到《悲書》經費係由國安局支付。²⁴ 在開始研究《悲書》時經費如此周折，閱讀吳文，可知此項經費應是魏教授提出，本人到閱讀吳文方知此事（說來可能有人不相信，但事實確實如此），他們兩人為何對本人如此地保密？可能知道本人的個性，一旦告知經費來自情治單位，非胡佛研究所支出，可能本人會馬上退出團隊，而他們兩人都很忙，沒有時間去閱讀資料及做口訪，那麼計畫就無法執行。這或許是他們兩人至終都未告知《悲書》經費之事的原因！自然

¹⁹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二）鎮壓過程，頁 219。

²⁰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二）鎮壓過程，頁 220。

²¹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三）責任歸屬，頁 220。

²²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三）責任歸屬，頁 221。

²³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三）責任歸屬，頁 222。

²⁴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三）國安局對合作計畫的評估與看法，頁 207。

本人也未曾見過他們簽約的內容！

在《悲書》開始研究時，據馬若孟生前有一次告訴本人，當時海外有一華文記者，有一天造訪他，問他最近有何新作？馬若孟告訴這名記者，他將與朋友要作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這位記者事後加以報導，但他報導此事時，胡佛研究所方接受了臺灣捐贈的三百萬美金，因而也就引起一些媒體和學界揣測這三百萬美元是國民黨用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經費，希望能主導二二八事件的「解釋權」。據說當時海外華文報紙喧騰一時。為此，本人也曾問過馬若孟，到底《悲書》經費是否由那三百萬美元支出？馬對本人答說，此研究計畫與那三百萬美元無關，所以當時本人就以為經費應是來自胡佛研究所。學界對《悲書》經費存疑者，如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蕭欣義教授，他說：「《悲書》出版前二個月就傳聞國府黨政當局間接透過徐旭東捐贈鉅款給胡佛研究所，出資買名譽，而《悲書》的出版疑與國民黨有些瓜葛。」²⁵ 他還寫了一篇長達 26 頁的書評。²⁶ 可惜學界的存疑已是在《悲書》完稿和即將出版前，否則本人一定追根究底。但蕭欣義教授認為「至於國府與《悲書》有無幕後瓜葛，則不擬過問。縱使有所瓜葛，只要作者堅持嚴肅的學術準則，那麼本書就值得肯定。」²⁷ 事實上本人與國外學者合作並非只有馬若孟，本人也曾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歐本那校區）政治系的于子橋（G. T. Yu）教授合作過。本人因相信馬、魏兩人的學術聲望，所以就未曾過問馬經費的來源。《悲書》的計畫主持人為馬若孟，他彙整了我們應致謝的單位（含提供經費之機構）及學者專家，並說：“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the Hoover Institution, which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for preparing the maps and photograph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nd financed the travels of Drs. Lai Tse-han and Wei Wou when they visited the Hoover Institution.”²⁸ 這就是本人一直認為該書的經費是來自胡佛研究所的原因。

²⁵ 蕭欣義，〈評賴·馬·魏新著《悲劇的開端》〉，收於陳琰玉、胡慧玲文字編輯，《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財團法人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2），頁 335。

²⁶ 蕭欣義，〈評賴·馬·魏新著《悲劇的開端》〉，頁 335-361。

²⁷ 蕭欣義，〈評賴·馬·魏新著《悲劇的開端》〉，頁 336。

²⁸ “Acknowledgements,” in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pp. vii-viii.

吳君能從檔案告知《悲書》的經費來源，本人還是感激他的發現，否則馬、魏兩人已作古，更無從問起。但吳君說把《悲書》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歸類為「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實為不妥。本人應是「失聯黨員」，而本人在臺灣加入國民黨，正如很多人是因公教人員之故，從未積極參加黨團活動，從本人在黨的考績都是60分，即可知。（本人得知此考績乃因有在臺黨部工作的熟人告知）。

我們三人在討論《悲書》研究前，本人即表明研究「必須公正客觀，著作才有被接受的可能。因此，它必須有『二二八』的檔案資料，理解受難家屬的心聲，以及良好的史學訓練，三者缺一不可，否則多一本或少一本『二二八事件』的著作，都無關痛癢。」²⁹ 換言之，本人的要求「就是要公正客觀呈現史實」。³⁰ 因此，我們要做這一研究計畫，最終三人達成的共識是「以學術立場來做這項研究」。³¹ 所以，《悲書》和《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本人只是忠於「學術」研究，從未以國民黨的學者自居。兩書均沒有黨方或政府官員與本人接觸過，遑論訂有合作契約之事（本人到安全局閱讀檔案文件，係由魏萼先與安全局人員交涉好，才由魏教授致電本人前往閱覽圖書文件；安全局則由一葉姓人員陪同，未曾見過其他人，所以1985年10月24日電告國安局詢問馬若孟可否到局看資料；同年11月6日與馬若孟、魏萼到國安局看資料，均是與葉姓人員聯絡，但本人不知他的職銜及全名。）。因此，吳君說二二八事件在本人主導的兩個研究，他認為是「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是否犯了「抱有成見，過度解讀」文本的重大弊病？

本人治史數十多年，均本著治史應客觀中立的原則，從未有所謂掌握或主導「解釋權」的想法。蓋史學著作需以「理」服人，並非以誰最早出版著作，就有主導「解釋權」。蓋搶「解釋權」均為政客的說詞，史學著作若經得起考驗，方可成為經典之作或一家之言，故學界根本不可能存在主導「解釋權」的說法。

²⁹ 賴澤涵，〈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與相關問題的參與〉，收於賴澤涵主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三十週年論壇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2），頁29。

³⁰ 賴澤涵，〈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與相關問題的參與〉，頁29。

³¹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謝國興訪問、陳南之記錄整理），《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臺北）13（1992年3月），頁98。

為了經得起學術的考驗，在《悲書》英文版正式出版前，馬若孟建議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1987年4月將在波士頓召開，我們是否把本書要點濃縮成三篇論文，在學會組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發表，於是三人都表贊同。本人當時分配的題目是“Grievance, Social Tensions and Social Violence: October 15, 1946 - May 15, 1947”，本人感覺此題不妥，因為這會討論到二二八事件的省籍衝突、傷亡等重要問題。蓋二二八事件研究在當時的臺灣，還是很敏感，更何況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出國發表論文，院方還是需要審查，而當時的總幹事韓忠謨先生是位忠黨之士，對本人入中研院服務也有意見，乃改以“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War Years and Changing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1940-1945”一文，才獲准出國發表論文。

亞洲學會為我們這一研究小組找了田弘茂教授和Lloyd E. Eastman（易勞逸）教授（本人在伊大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擔任評論人，他們兩人對國民黨都有相當的研究，且有專著出版，請他們來評論我們三人的論文，是相當的合適。當天參加這一組討論會的人很多，而且會後也有一些輿論報導，但他們兩人認為這三篇論文都「非常學術性」，³² 當然我們的觀點認為二二八事件在當時不論誰來接收臺灣，恐怕都是無法避免的，但Eastman批評說：「哪個事件是不可避免？歷史上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³³ 因Eastman教授批評得有理，我們將原來認為二二八事件不論誰來接收臺灣，事件都很難避免的說法加以修改，再送出版社審查。

《悲書》出版後，本人至少看到英文期刊有兩篇書評及《紐約時報書目》介紹過。William Speidel（史威廉）在*The China Quarterly* 評論《悲書》在史實、結論和參考書目對研究者有幫助。³⁴ John Copper（康培莊）則認為「本書為該研究題目寫得最好，對臺灣歷史和政治有興趣者必看」。³⁵ 而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Jonathan Spence（史景遷）在其“The Other China”也介紹了《悲書》，³⁶ 這些書評

³²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1。

³³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1。

³⁴ William Speidel, “Reviewed Work: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By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132 (Dec. 1992), pp. 1180-1181.

³⁵ John F. Copper, “Reviewed Work: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By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66: 3 (Autumn 1993), pp. 416-417.

³⁶ Jonathan D. Spence, “The Other Chin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ew York) (Oct. 22, 1992), pp. 12-16.

或介紹都沒有人認為《悲書》是為國民黨講話的書。

至於學術著作，國民黨最痛恨的美國學者 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在其 *China: A New History* 一書，³⁷ 也推薦為閱讀書目。如果《悲書》是為國民黨說話的書，相信費正清不會不批評反而加以推薦為閱讀讀物的。

在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任教多年的徐中約教授（Immanuel C. Y. Hsü），他寫了一本《近代中國史》的教科書，³⁸ 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教科書，風行了二、三十年。他除了引用本人在臺灣〈中央紀念週〉的一篇講稿外，³⁹ 也推薦《悲書》為進一步的讀物。⁴⁰ 綜上，可說明只要是學者，沒有人會認為《悲書》是國民黨的著作，他們都是站在學術的立場引用或介紹。

1980 年代的後半期，臺灣社會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呼聲愈來愈高，政府迫於社會的壓力，執政黨不能不加以面對，召開黨、政會議多次，採納前總統府資政邱創煥的建議，邀請學者作研究報告，並將報告公之於世。吳君在該文（四）初稿發表與成書出版的文末說：「1991 年賴氏獲得府院高層的青睞，成為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委員，也是……，並掛名報告總主筆。」⁴¹ 這只是部分事實。本人從未獲得府院高層的青睞，這是行政院在 1990 年 12 月召開小組討論要如何進行工作時，大家均默不作聲，不知如何從事，本人因做《悲書》研究時曾訪問過葉明勳，而他知道本人曾研究過二二八，且他也注意了 1987 年在波士頓的會議，是他提名本人出任總主筆。這個總主筆不是掛名，而是要實際做研究，要參與每個會議，從未有半日閒，而且要為檔案資料絞盡腦汁的人。至於報告的寫作，本人的態度是開放的，要大家秉筆直書，若有問題本人會負起全責，絕不推諉他人。⁴² 此外，我們要提醒任何治史者，後來行政院成立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有 8 位：即葉明勳、陳重光、張玉法、陳三井、李雲漢、遲景德、何景賢和本人。這八位中只有何景賢代表當時臺灣省主席連戰參加過政府處理二

³⁷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71.

³⁸ Immanuel C.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th Edition).

³⁹ Tse-han Lai, "She-hui-pien-chien chung ti chia-ting chih-tu (The Family System in Changing Society)," *Overseas Scholar*, Jan. 31, 1985, pp. 11-15, in Immanuel C.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p. 909, note 11.

⁴⁰ Immanuel C.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p. 758.

⁴¹ 吳文，三、編寫拂塵專案英文著作，（四）初稿發表與成書出版，頁 213。

⁴² 詳參陳翠蓮，〈星期人物：二二八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自立晚報》，1992 年 2 月 16 日，第 2 版。

二八事件的會議。⁴³ 行政院由副院長施啟揚召開第一次處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會議上，問大家如何處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時，何景賢並未發言或推出人選。另外，本人需提醒吳君，國民黨是不可能指定本人出任總主筆的。國民黨黨政人士豈有不知本人的博士論文對「先總統蔣公大不敬」之事？何況二二八事件又與蔣家有關。故國民黨要本人出任總主筆，應是吳君想當然爾。歷史研究不可一廂情願去推論，因為推出來的結論，可能與事實相反。

本人在選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的研究員時，從未考慮過他們的政治傾向，本人甚至在討論執筆人選時也提了一些民間學者共同參與「有助於了解真相。我還提了幾個人，但未獲通過，我也沒有辦法。」⁴⁴ 此事在去年（2022）2月25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主辦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週年之回顧論壇」第四場為許雪姬教授、方惠芳教授所提之「回首我的二二八研究1999-2021」，而李筱峰教授為該論文之對談人，他亦提及此事。

本人如果要為國民黨講話，那為什麼要有7位審查委員審查《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七人中至少有二、三位對國民黨是相當批判的學者。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查人不只7位，委員中李雲漢教授審前言、背景和結論；第二至第五章分別由陳三井、何景賢、張玉法和遲景德審查，⁴⁵ 一個研究報告有12位著名學者審查，且審查人大都是研究近代史卓越的學者，如果這一研究報告沒有公正客觀，能夠過關嗎？

至於研究報告是否公正客觀，除學者的認定外，當然也要看受難家屬的態度。受難家屬當時的代表是林宗義教授，林教授父親林茂生教授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林宗義教授其實就是二二八事件的見證人，他對記者說：「我肯定這份報告具有正面意義，並稱許研究人員的客觀公正。我們深信，他們都秉著專業精神與科學立場說話。」⁴⁶ 曾奉蔣經國總統之命看完了《大溪檔案》有關二二八事件文獻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看完報告，他對報告的執筆者說：「本著忠於事實的

⁴³ 賴澤涵，〈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與相關問題的參與〉，頁38-44；吳俊瑩，〈歷任總統對二二八轉型正義的作為（1988-2019）〉，收於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下冊，頁1049-1120。

⁴⁴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9。

⁴⁵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11。

⁴⁶ 〈以誠立史〉，《聯合報》，1992年2月23日，第3版。

態度和客觀超然的立場，對事件作了完整的綜述，把經過公諸於世，各方對報告的平實公正都予肯定。」⁴⁷ 最後他評這份報告說：「『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固已盡到超然、公正、忠於事實的職責，國內外各方人士大多予以肯定」。⁴⁸

至於有人要知道的是到底國民黨或政府官員有沒有干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之陳重光先生說：「老實講上這次最漂亮的，政府沒有一句話摻在裡面，所以，報告是非常公正的立場。」⁴⁹ 曾獲美國兩次普立茲獎、派駐北京的《紐約時報》特派員 Nicholas Kristof 也認為國民黨當時沒有干預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者，這是大開民主大門，因而肯定這份研究報告。⁵⁰

研究報告公布後（1992年2月22日），媒體找不同人評論，也有記者問本人與國民黨的關係、對報告有無預定立場，訪問了一些執筆人或學者，其中《自立晚報》記者陳翠蓮（現任臺大歷史系教授）就想解答這些疑惑。她曾在《自立晚報》的〈星期人物：二二八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談到本人與馬若孟在《悲書》的關係說：「賴自認在研究工作十分忠於歷史，慎重其事，只有在不影響大局下，修改小觀點是可以的。」⁵¹ 她也訪問另一位學者有關本人與國民黨以及研究報告的立場問題，一位學界人士說：「賴澤涵好名是有的，但批評他立場傾向國民黨則並不公允。」一位參與撰寫人士強調，「在學術研究上，賴澤涵並未有先存立場，並充分尊重撰寫人。他也充分授權……基本上賴澤涵並沒有向官方妥協。」⁵² 此外，她也提到一位撰寫人士指出，「若不是賴澤涵熱心奔走，不厭其煩，沒有一般學者的固執性格，調查報告的工作，未必能順利完成」。⁵³

《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也談到「有人更公開批評賴澤涵在為國民黨歌功頌德，完全失去學術立場。而賴澤涵參加行政院研究小組行列，也被嘲笑是『吃人

⁴⁷ 張祖詒，〈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初讀「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有感〉，收於張祖詒，《帶珍集：那些年，還未褪色的感時與懷舊》（臺北：世界書局，2012），頁169。

⁴⁸ 張祖詒，〈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初讀「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有感〉，頁178。

⁴⁹ 何旭初，〈研究小組召集人 陳重光看報告 打80分 未摻一句官話 最漂亮〉，《聯合報》，1992年2月23日，第3版。

⁵⁰ Nicholas D. Kristof, "The Nightmare 2-28: Taiwan Rips Past Ope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April 13, 1992), p. 4.

⁵¹ 陳翠蓮，〈星期人物：二二八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自立晚報》，1992年2月16日，第2版。

⁵² 陳翠蓮，〈星期人物：二二八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自立晚報》，1992年2月16日，第2版。

⁵³ 陳翠蓮，〈星期人物：二二八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自立晚報》，1992年2月16日，第2版。

家的飯，聽人家的話』，不過也有人在學術研討會的公開場合為賴澤涵辯白。種種現象，正赤裸裸說明二二八研究是如何包含意識形態、反對國民黨情緒的一種複雜心情」。⁵⁴

另外，《聯合晚報》記者署名文大培的在〈人物臉譜／賴澤涵兩個堅持：學術百無禁忌，食物吃的鄉土〉說本人「就是對學術的好奇和投入。學術不能為政治服務，無黨無派的賴澤涵說，解嚴後更當如此。早些年海外傾向臺獨主張的人，曾批評賴澤涵研究二二八是替國民黨搶歷史解釋權，賴澤涵無奈地批評說這種話的人『不是（毫無）學術就是垃圾』，令人又好氣又好笑」。⁵⁵

由這些事實證明《悲書》和《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在學界看來均是學術著作，沒有人會認為這是為國民黨的著作，至於馬若孟和魏萼與安全局簽約，從未影響本人起草《悲書》的學術立場。而《悲書》所以會比《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探討的問題較少，本人在1992年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謝國興教授訪問時，就講得很清楚，本人說，「《悲劇的開端》寫成，第一手官方檔案可以說沒有用上。」⁵⁶ 本人也說，在《悲書》很多問題沒有處理，因為「在當時都沒有辦法做」。⁵⁷ 但到1991-1992年時，也就是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在研究撰寫時，臺灣的大環境已有很大的改變，可是警總還是不肯繳出二二八事件的檔案，逼得本人要辭總主筆以示抗議。⁵⁸ 警總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繳出兩箱跳號不連貫的公文。而這些資料確實有助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所以本人才說：「現在就研究得比較細，而且分區來作會精密一點，所得到的事實可能會比較完整。嚴格講起來，現在跟當時〔按：指《悲書》研究時〕言論尺度也不一樣，資料比較齊全，工作人手也不同。不過當初因受限於資料，原本不認為是問題的，現在可能是問題。」⁵⁹ 而且在《悲書》研究時「當時未解嚴，書中用字會比較謹慎，比較和緩，不會引

⁵⁴ 林照真，〈賴澤涵政治事件歷史觀學術研究留見證〉，《中國時報》，1992年1月12日，第23版。

⁵⁵ 文大培，〈人物臉譜／賴澤涵兩個堅持：學術百無禁忌，食物吃的鄉土〉，《聯合晚報》，1992年2月16日，第11版。

⁵⁶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1。

⁵⁷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3。

⁵⁸ 江中明，〈蒐集二二八史料 部分單位不合作 政院工作小組召集人賴澤涵萌生辭意 研究小組人員慰留 將向施啟揚報告困境〉，《聯合報》，1991年5月28日，第4版。

⁵⁹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3。

起大的爭論，現在因為資料比較多，遣詞用字可能就會不一樣了。」⁶⁰ 所以吳君並沒有仔細閱讀謝國興教授訪問本人的訪問稿（雖然參考書目也引了此篇），其實該訪問稿本人也清楚交代《悲書》和《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會有不同的原因，換言之，在研究人員、資料和撰寫時的社會環境都有很大的不同，這就證明本人和我們的研究夥伴是依史料在說話，即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看到的檔案資料，就不能隨便下筆的史家治史態度。

所以本人在此必須慎重的表明，本人不是國民黨的黨員，我所負責的兩本書不能代表國民黨的態度，何況黨、政人士也從未與本人接觸過，更談不上指示過，兩書之所以會有大的差異實在是因時代的變遷與檔案資料的開放有關係。本人不厭其煩地引用著名學者對《悲書》的學術評價，都是站在學術的角度，至於《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是否公正可觀，在臺灣的報章雜誌都有很詳細的報導過。若它不公正，替國民黨說話，有可能為世界重要媒體所接受嗎？二二八事件在臺灣史上是一件大事，但我們從沒有想到世界重量級媒體如 *The New York Times*、*B.B.C.*、*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Los Angeles Times*，日文的《讀賣新聞》，法文的 *Le Monde*，德文的 *Der Tagesspiegel*、*Newsweek* 等等，他們都花很大的篇幅報導，他們是感到報告的公正客觀而報導，我們從未宣傳過，這些報導和訪問都是本人始料未及的。

吳君在撰寫此文，不知是否抱有成見？此外，吳文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做任何的口述歷史工作。二二八事件的執筆人有5位，委員有6位，審查委員有7位，兼任研究人員有3位，這二十多位據本人所知他們大都健在，他們都可以告訴吳君想要知道的問題，他們都在臺灣，為何不去請教他們，到底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政府有無干涉？國民黨有無介入？總主筆有無提供《拂書》、《悲書》給執筆人參考？有無指示如何撰寫？執筆者有無為國民黨說話的指示等。此外，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有的資料均已送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這應是吳君撰寫此文的重要檔案資料，然吳君卻未加引用，實為可惜。如薛化元教授在本人主編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三十週年論壇文集》之〈序〉文有「如賴澤涵教授在〈序〉中所提，許雪姬教授建議將行政院二二八小組的檔案資料選出部

⁶⁰ 賴澤涵，〈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頁103。

分作為附錄，基金會雖然努力協商，但仍然無法在出版前取得檔案，來不及收入在本書中。」⁶¹ 吳君如能在撰文前好好利用該批檔案，尤其是審查人的審查報告，再加上訪問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委員、研究員（執筆人）、兼任研究員，相信對該文應有相當的幫助，下筆才不致讓人感覺不夠中立客觀。治史得秉持「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此乃治史之最基本要求。若未依證據而做出的推論，恐將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至於吳君在結論中說《悲書》「反覆強調二二八起因，是包括文化衝突在內等複雜的主客觀因素，此一看法被植入 1994 年時報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結論，作為檢討軍政人物的一種平衡論述，更不說蔣介石『失察之疵』、『考慮未周』的檢討字眼，在初版一刷消失。」⁶² 對於吳君認為文化因素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過分強調，似乎是在為某些人員開脫責任；再者，審查人員如此之多，且都沒有人提出異議或反對，吳君有不同看法，本人予以尊重。

至於吳君言，時報版在初版二刷「將檢討蔣介石作為的段落放回，但新增一大段……1992 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所無，導致二二八悲劇的主客觀因素『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⁶³ 吳君認為這「顯然是負責撰寫結論的賴澤涵有意的刪改與調整。」⁶⁴ 這完全是錯誤的推測，蓋本人所撰寫之結論，均由其他 4 位執筆人所提供，最後定稿亦均經過所有執筆人逐字討論。本人的增刪只在訂正錯別字及增加研究書目而已。研究報告從定稿送到行政院後出版，本人從未接到任何電話說要增刪字句。至於是何人將結論撤出再放回，本人並不清楚。而當時時報的編輯人員多已退休，加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保護且書之出版已經近三十年，實無法查證。綜之，本人在定稿之後從未增刪任何文句，特此說明。

誠如前述，本人治史數十年，堅定秉持一貫之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絕對是經得起考驗。在課堂上，本人經常告訴學生，歷史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務必得經常反思自己是否預設立場或帶有意識形態治史，因為歷史之筆是負有重責的，故應抱持著謙虛、清楚的頭腦、小心謹慎的態度從事研究工作。相較於早期

⁶¹ 薛化元，〈序〉，收於賴澤涵主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三十週年論壇文集》，頁 iv。

⁶² 吳文，五、結論，頁 225。

⁶³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一）事件背景，頁 215；（三）責任歸屬，頁 222。

⁶⁴ 吳文，四、二二八歷史解釋觀點的轉向與延續，（三）責任歸屬，頁 221。

治史經常受限於政治環境，現在臺灣的民主政治成熟度高，言論自由，檔案更易取得，治史者更應拋棄成見或意識形態，以具體的證據及建設性的意見進行交流，方能提升臺灣史學界的水準。

引用書目

《中國時報》

《自立晚報》

《聯合晚報》

《聯合報》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吳俊瑩

- 2021 〈歷任總統對二二八轉型正義的作為（1988-2019）〉，收於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下冊，頁 1049-1120。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2022 〈「拂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臺灣史研究》（臺北）29(4): 173-230。

張祖詒

- 2012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初讀「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有感〉，收於張祖詒，《帶珍集：那些年，還未褪色的感時與懷舊》，頁 168-179。臺北：世界書局。

蕭欣義

- 1992 〈評賴・馬・魏新著《悲劇的開端》〉，收於陳琰玉、胡慧玲文字編輯，《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頁 335-361。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財團法人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賴澤涵

- 1992 〈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謝國興訪問、陳南之記錄整理），《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臺北）13: 98-112。
- 2022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與相關問題的參與〉，收於賴澤涵主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三十週年論壇文集》，頁 29-68。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賴澤涵（總主筆）

- 1994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

- 1993 《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薛化元

- 2022 〈序〉，收於賴澤涵主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三十週年論壇文集》，頁 i-iv。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蘇僧、郭建成

- 1986 《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美國加州：南華文化事業公司。

Copper, John F. 康培莊

- 1993 “Reviewed Work: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By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66(3): 416-417.

Fairbank, John King 費正清

1992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sü, Immanuel C.Y. 徐中約

1995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th Edition.

Lai, Tse-han 賴澤涵, Ramon H. Myers 馬若孟, and Wei Wou 魏萼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peidel, William 史威廉

1992 "Reviewed Work: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By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132: 1180-1181.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遷

1992 "The Other Chin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ew York) (Oct. 22): 12-16.

Jeh-hang Lai's Response to Chun-ying Wu's Article

Jeh-hang Lai

ABSTRACT

Dr. Chun-ying Wu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Fu Chen Project’ and Academic Turn of Kuomintang’s Interpretation of 228 Incident” in Vol. 29, No. 4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article, he cites two books and a research report: *Fu-ch’ü li-shih ming-ching chung te ch’ên-ai* 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 [Flicking the Dust off the Historical Mirror],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and *Research Report on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Wu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se three works were written at different times with some adjustments in viewpoints, they essentially continue certain arguments that tend to absolve the Kuomintang from kill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aspects like incident background, suppre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the author of the latter two works, I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Let the evidence speak,” and rely on available archival materials to write this article in rebuttal to Wu's relevant arguments about the two works, aiming to clarify the facts.

Keywords: Ramon H. Myers, Wei Wou, Kuomintang,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